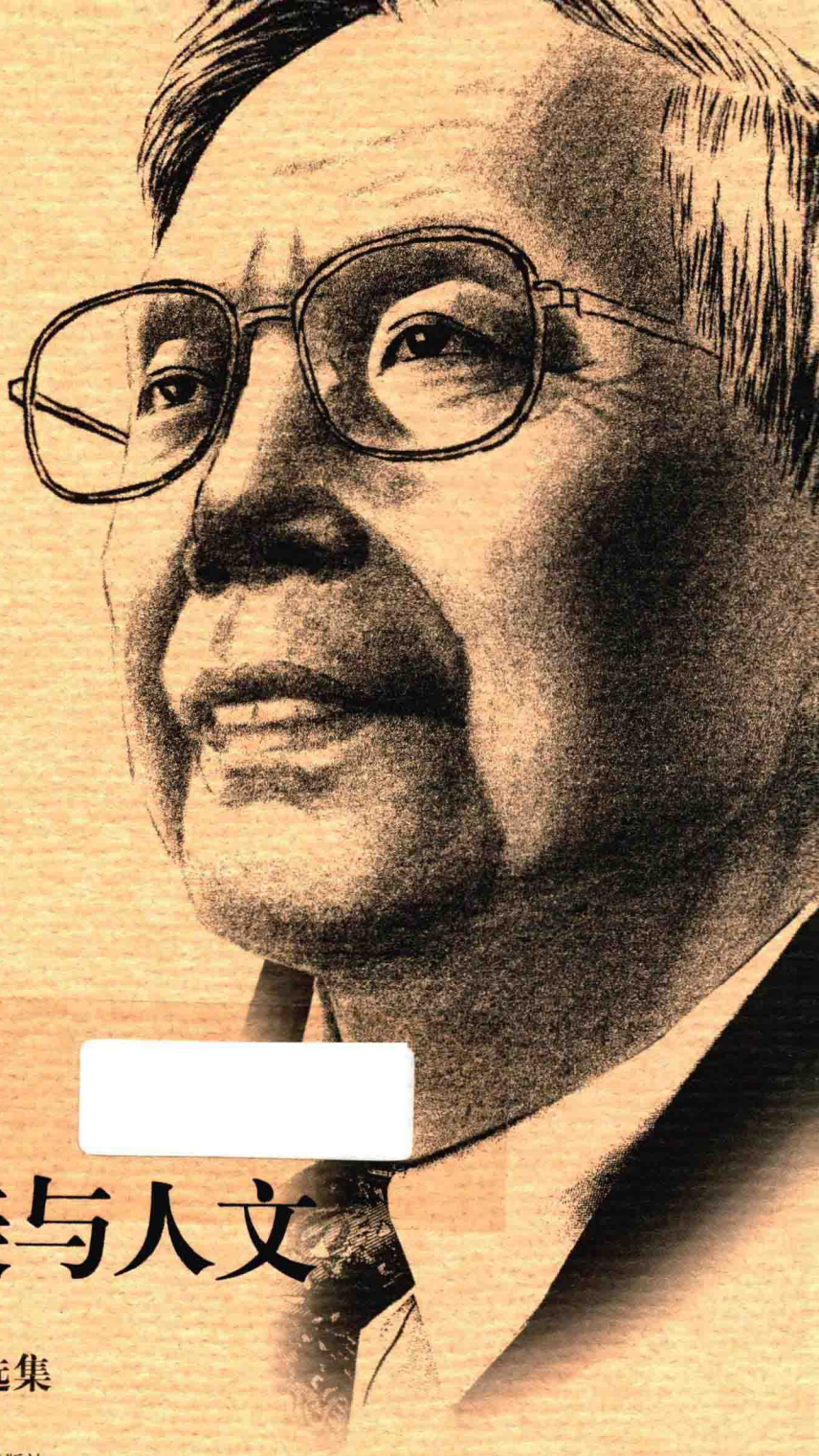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审美与人文

钱中文自选集

钱中文◎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HEHMEI YU RENWEN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钱
中
文
◎
著

审美与人文

SHENMEI YU RENWEN

钱中文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与人文：钱中文自选集/钱中文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56-2826-9

I. ①审… II. ①钱…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2947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SHENMEI YU RENWEN

审美与人文

钱中文自选集

钱中文 著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杨林玉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 000mm 1/16

印 张 33.5 插页 1

字 数 354 千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史秋秋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宋贵伦 张文启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周一兴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满运来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委会副主任 赵 峰 孟春利 刘 颖 梁立新 荣大力 王野霏
杨生平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孙武权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张 际 陈 来 陈平原 陈雨露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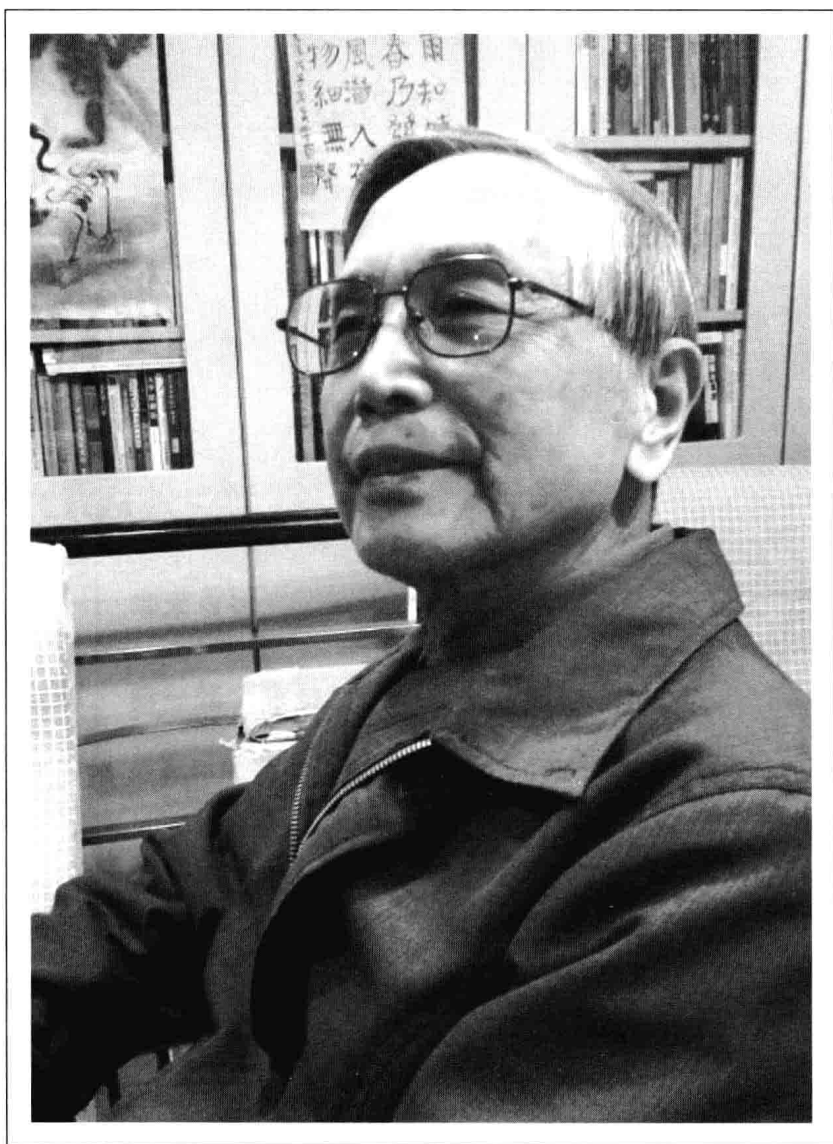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9年11月



钱中文先生

学术自述

1932年11月，我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东北塘乡的西浜村，本名钱剑平。1937年5岁时开始记事，是年初冬，日本鬼子攻陷无锡，路经我村，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亦险些被日本鬼子挑死，凶残、恐怖的印象，至今难忘。次年我进入村里的私塾，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古文观止》中的前后《赤壁赋》和当时的“国语课本”等，不久后就进入邻村的“洋学堂”——一所完全小学。1942年4年级时，考入无锡县实验中心小学读书。1945年夏小学毕业后，考入无锡县中学直至1951年高中毕业。1951年夏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读书，为供给制，学费膳费全免，但第二年改成薪金制，由于我是青年学生出身，每月补助反而减了，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也无法每月节约几块钱补助家用。1955年毕业后，经考试被保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的俄罗斯语文系学习，专业为俄罗斯文学，1959年肄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一直至今。

我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就爱好课外阅读，稍后迷恋武侠小说。初二时，国文老师启蒙了我，他讲解“五四”后的新文学使我极为入迷，他说这种文学是写底层老百姓的血和泪的文学，是为劳苦大众呐喊的

文学。我总把他提到的新作家的作品想方设法找来阅读，而且有了些小钱就买，买新文学作品渐渐成了我的爱好，这样，我就告别了武侠小说，直至今天。那时我不仅喜爱新文学，甚至也想写作这类作品，将来当个作家的念头悄然而生。于是初三开始，我就自己练习作文，随笔、速写、记事、故事、童话都写。初三毕业，直升高中，免去考试，我就利用暑期又写了不少，积累起来有五个练习本之多。不久前整理旧物，竟把它们翻了出来，只缺少第4册，真是令我惊喜不已。初三毕业的暑期结束，我想我写了那么些东西，何不选些出来向报纸投稿呢？于是向《人报》投去两篇速写，竟是都登了出来，这使我加强了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的念头。但是当时这种想法是不敢和别人说的，父亲不会赞成，同学也会嘲弄，那时都认为，只有学好数理化，将来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是我要当个作家的梦想，竟是慢慢地破灭了。随着时局的巨变，特别是进入人民大学后，每星期六下午的生活检讨会上，总要暴露自己的不符合党的要求的个人主义。我的当个作家的理想，会妨碍将来派我当个俄文教员的光荣任务，会动摇学好俄文的专业思想，所以，不断自我批评与受到批判，两年之后，我决心抛开当个作家的念头，确立了人民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观点。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有幸进入了文学研究所。

1959年9月我进入文学研究所，选择了苏联东欧文学组，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工作。那时适逢反右倾运动，组织上要我参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阅读何其芳、蔡仪先生的各类著作，包括解放前的，揭发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我就十分专心地阅读文艺理论书籍。结果是，在阅读何其芳、蔡仪先生的解放前后的著作中，惭愧地我并未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并未找到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却让我获得了理论阅读的愉快，对

文艺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60年随着反右倾运动而来的是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我被编入了批判小组，极“左”思潮继续肆虐。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我先是与叶水夫先生合作撰写了《国际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必须批判》的长文，接着我个人写了《反对修正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歪曲》的文章，都发表在1960年第4、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但是同时，我利用晚上时间，拼命补课，学习各种文学理论、文学史书籍，还写作一些不识时务但属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文章，如《灵感漫谈》《艺术创作中的想象》《细节描写与典型化》等文章，发表在《文汇报》《新港》等刊物上。当时刊出有关“灵感”“艺术想象”的探讨，也实在是空谷足音。1961年，我正式向所领导要求调入文艺理论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我觉得文学理论中问题多得很，值得深入研究，幸蒙何其芳所长一口答应，并经他多方协调，就把我调入了蔡仪先生主持的文艺理论组，所以后来，我一直把何其芳、蔡仪先生当成我进入文艺理论领域的引路人的。这时期，我还写了些“大批判”文章，都是报纸来约的，涉及好几位老专家，都是批判“人性论”的，其实那时我何懂“人性”！我不过是搬用别人的话语而已。及至后来我在“文革”中受到非人待遇，我明白我遭到反“人性论”的报应了！20世纪80年代初自我反思期间，我向被我触动过的老专家道歉，心里才慢慢平静下来。有的是我少年时喜爱的老作家，我久久打听他的下落，后来得知他早就去世了，这消息使我默然良久！

1961年，苏东文学组的戈宝权先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商量好，要出套通俗的外国作家评传丛书，以传播外国的进步文学，由戈先生担纲，戈先生邀我写本果戈理评传。于是在去理论组之前，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戈先生之约，交出了《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的书稿。后来运动连年，一会儿整社，一会儿劳动锻炼，一会儿批判文化

界的修正主义、裴多菲俱乐部，批判封资修、大洋古、帝王将相，一会儿又是“四清”。1966年5月底，已在江西待了10个月搞“四清”的我，连夜被召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坚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地投入运动。结果“文革”10年，被唤醒了的人性中最为卑鄙无耻的东西到处肆虐，传统道德被践踏，知识有罪，知识分子被批斗，可说人性沦丧，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则成了多年的专政对象，在身心上备受煎熬。

1978年开始了新的生活，国家奉行开放改革政策，我则全力倾注于学术研究，日夜劳作，努力弥补失去的大好时光。1980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是本小册子，即戈宝权先生于1962年交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部书稿《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据闻，“文革”时期，外地的造反派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时，曾把这部书稿当作封资修废物丢到走廊的垃圾堆里，幸亏出版社的一位清洁工把它捡回来送还编辑部。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第1期上刊有我的《推倒诬蔑，还其光辉》一文，是批判“四人帮”歪曲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种种谬论的，此后一直到1984年，每年的《文学评论》都有我的论文。这些文章主要结合当前文学创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或是有关理论本身的论争。如1980年的《论艺术真实和艺术理想》一文，主要针对当时文艺创作的“真实性”问题而发，新疆的《图书》杂志把它译成维吾尔文全文刊发。1981年发表的《论文艺作品中感情和思想的关系》一文，主要针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一些文学创作随着运动的需要而走向思想的赤裸裸的表达，失去了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文章通过对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表现感情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相互关系的曲折性。1982年发表的《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一文，完全是针对使文学创作蒙难了几十年的“人性

论”问题引起的大讨论而发的，文章自然认为人身上具有阶级性，同时也肯定共同人性的普遍存在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而又复杂的表现形态。同时该文还提出了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后来我对这一观点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演化而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说。这3篇文章较有影响，被收入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年，理论一集上、下卷》中。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现代主义创作原则中的几个问题——兼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特征》和《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文学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长文，两文针对当时有关“现代派”文学思想的争论表示了我的比较系统的观点，缺点是我虽然对现代派文学并不否定，并对现代主义文论思想进行了细致分析，但我倾向现实主义的态度是明显的。同年《文学评论》又发表了我两篇文章，一篇是对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所作的评论，一篇是探讨文学理论方法论更新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我后来所持有的几个观念：文学创作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1985年年初，《文学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长文，获1978—1984年《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在这几年里，我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这一文艺思想，完全给我国极“左”的文艺路线搅乱了，然后又给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理论弄得似是而非，再经我国一些极力主张现代派文学的学者的歪曲，现实主义理论被搅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现代主义文艺思想进行分析，把它与现实主义进行比较，并就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及其理论原则的演变，进行了阐释。1985年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第4期的《论艺术的假定性类型和文学的真实性形态》和《生命在于运动——现实主义是不断的综合和创新》等长文，就是我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特征与创作思潮的比较深入的探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最初几年，我一面努力写作，一面在进行自我反思。反思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文革”理论算是什么理论？拨乱反正的“乱”固然明白，可是这个“正”真的就是那个“正”吗？学术是探索真理的部门，是文化、文明的建设。在几年时间里我不断反省自己，批判自己，纠正自己的文艺思想。大体明白了今是而昨非，精神上就有一种解放之感。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文艺理论室获得一个国家重大项目，编写一部《文学原理》。经过多次酝酿后，我们一致确定，一，各方面要求出版一本新的《文学原理》的呼声很高，但“新”在哪里是个关键问题。如果过去已经出版过 100 部类似的文学概论这样的书籍，那么我们不能写成第 101 部，而应写成第一部，要注入新东西。二，为此，我们必须批判过去，了解过去，同时更应去了解中断了多年的外国文论新发展及其新动向。三，要赶快组织翻译各种外国文学理论著作，成立了编辑小组，出版“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四，经过几年的酝酿，大家觉得将《文学理论》写成一书，十分不易，主要是几位写作者虽有共同思想，但个人风格已日渐明显。于是经过协调、讨论，将《文学原理》分成 5 部书来写，即从作品开始，写作《作品论》；再引入作家，写作《创作论》；再深入一步，引入读者、批评家，写作《欣赏论》与《批评论》；最后是《发展论》。从整体来看，这 5 个部分在当时来说是颇有新意的，同时分了工，由我撰写《文学原理——发展论》。随后，我很快提供了俄语、英语方面的一些外国名著，如美国韦勒克等人的《文学理论》、苏联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以及其他国家学者的著作，组织翻译，后来出版了 14 种，很有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的写作，不仅是我学术上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清理，让我站到当代的学术前沿，而且为我下半期的写作《文学原

理——发展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下半期我主要探讨了文学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审美意识、审美反映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即文学创作的思维特征与文学的本质问题，这是讨论文学发展时所回避不了的。

1985—1986年间，我的思考终于成型。1986年我刊出了《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长文。新时期最初五六年间，认识论文学观与反映论文学观备受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从西方引进过来的任何文学思想、主义一律都好。但是我看事情并非如此，新引进的各种思想确有新意，长人知识，但片面性也极明显。过去的反映论文学观本已被“左”倾思潮所歪曲，变得庸俗不堪，而现在一些学者欲将它置于死地，就把过去对反映论的庸俗理解，当作反映论的本意，大加挞伐，把反映论再一次地庸俗化。这一现象促使我深入地探讨了反映论，于是从文学的根本特征审美出发，提出了文学的创作是一种“审美反映”，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映，一般意义上的反映论难以阐明文学创作的特征、指导创作。同年年底，卢卡奇的《审美特性》中译本第一卷问世，都是谈“审美反映”的，我读后大为惊奇。我当时想，要是该书早几年出版了中译，我的文章可能会写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接着我集中力量探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这是审美意识自身的演变与发展、审美反映的必然逻辑。1987年，我在《文艺研究》第6期发表了长文《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1988年又在《文艺研究》第4期发表了《论文学形式的发生》一文。这两文实际上是我撰写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的第一编的核心部分。《论文学形式的发生》这篇论文是探讨人类远祖的原始思维、神话意识、神话思维的特征以及审美意识的形成，进而讨论审美意识与神话演变、神话原型

的出现、文学的前形式以及诗歌形式发生的前奏，探讨前文学向文学过渡的审美中介的确立，诗歌呼唤形式以及“有意味的形式”的形成，后世的作为话语、文字结构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历史形成。从社会结构的学说看，文学是一种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门类的意识形态如哲学、法学一样，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现象，但是文学的本质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即它是具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我一开始就将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性，融合于文学本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话语、文字不仅仅是符号，它们也是感情、思想、文化积淀的载体。所以，只讲审美而忽视它的意识形态性，同样不能科学地阐明文学的特性。这样，我就提出：“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这样来探讨文学起源及其本质特性，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

《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这篇论文，提出一个事物由于其多层次性而形成其多本质性，不同层次自有其量和质的规定性；肯定了文学观念、文学本质是一种多层次现象。文学作为审美文化，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的本质特性也是多层次的、多本质的。事物的多本质性，是经典作家都承认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应是文学的第一层次的本质特性。文学的第二层次的本质特征是它的本体特性，主要阐明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存在形式，如文学是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文学是主体的审美创造与审美价值的创作系统，文学是读者介入的审美价值的再创造系统，这三个方面组成了文学本体论。同时使用作品的层次结构的理论，确立作品本体论，并区分了文学、作品与文本三者

的关系。这些观点后来都汇入了《文学原理——发展论》，阐释文学发展主要是文学本体的发展，与文学本体三个方面相呼应，一，文学发展具体演变而为文学体裁的演变。二，是各个时期的创作个体的主体性与群体性的各种张力的作用，文学流派思潮的功能，创作范式的确立、原则与类型系统；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并未像一些人那样耸人听闻地宣布现代主义文学替代了现实主义文学，而是他们错把创作原则与流派、思潮混为一谈了。创作原则一旦形成，能够长期存在，并在不断地丰富中获得发展，而流派与思潮是不断更迭的现象。历史证明，比如现实主义流派、思潮一时替代了浪漫主义流派、思潮，但作为浪漫主义的原则与文学照样存在着，同样，现实主义好像被现代主义替代了，但替代的只是流派与思潮，而现实主义原则与文学照样存在发展着，因此我在文学的发展中揭示了更迭与非更迭现象。三，文学的发展是随着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出现审美价值的新变，在文学的接受史中尽情展现。这些特征的综合形成了文学第三个层次的本质特性。文学第四层次的本质特性，表现为文学的深刻的文化性。《文学原理——发展论》第三编提出“文化系统中文学”，即文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与审美文化的关系，与非审美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介于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的宗教的关系。所以提出并强调这一问题，在于当时的文学理论在外国文论“内在研究”的影响下，几乎把文学的文化根源视为文学研究的异端了。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作为创作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风貌与变迁。民族文化精神，与当代意识与国际文化的关系结合，组成了文学这一层次的本质特征。第四编是探讨文学史问题，作者比较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类型，从中可以窥见不同文学史类型的不同的文学思想观念；同时提出了撰写文学史的一种优化的选择方式，即审美的、文化历史的方法。使用这一方

法，可以使文学史研究达到历史与理论形态的高度融合与相互浸润，而走向新的高度。

“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后，得到文学理论界不少同仁的认可，并被他们在编写《文学概论》一类的书籍时加以采用，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观念后来得到了如童庆炳等一些著名学者的多侧面的阐发，成为近几十年来不少著名学者共同持有的文学观念。《文学原理——发展论》在1990年上海评议会上也得到了徐中玉、蒋孔阳等先生的肯定性评价，认为该书提出了新观念，新思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蒋先生说，“我讲达到的新水平，新的高度，是指在文艺理论中达到了国际水平”^①，其后蒋先生在其《美学新论》一书中，还征用了《文学原理——发展论》中的观点。1993年，《文学原理——发展论》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1992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并获1993年中国图书奖提名。20年后，朱立元先生说：“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就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在整体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并对此后文艺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从中期开始到20世纪末，我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段时间里，主要研究了文学理论与人文精神的问题，特别就“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与“巴赫金”交往对话学说，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撰写了系列论文。

① 见《〈文学原理〉——“创作论”与“发展论”评议会发言》，《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② 朱立元等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1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的思想家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社会，宣布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现代性应该抛弃，一切价值都已崩溃。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说：“上帝、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回顾近、现代的历史，几百年来对理性的过度崇尚，引发了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兴起，它们一面扩大、加深了人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同时它们的极端消极的一面，也走向了反理性主义思潮，甚至引发了战争的杀戮。人的生存的挫折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其变得空虚、平庸，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但是它的霸权的统制，使人文贬值与弱化，使人变为渺小的人。而在我们社会，把理性与现代性推向极端化、迷信化，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的灾难。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被介绍到我国后，经过几年时间的发酵，与我国的一定国情相结合，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作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似乎已经溃散，金钱的追求成为社会信仰，权力寻租泛滥，物欲情欲横流，价值失衡，道德失范，人性沦丧。在文化艺术方面，危机频频，表现为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不少作品醉心于滥情的描写。一些学者似乎觉得，中国现在已进入了后现代，他们对当今社会极为需要的“人文精神”，采取了嘲弄的态度，既躲避崇高，也鄙视任何崇高。其实，中国的现实，既存在前现代，也存在后现代现象，但主要的是需要进行现代的建设。面对上述哲学、历史、现实、文学艺术的实际情况，面对当今人的生存状态，我以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它的构架是，这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的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行为准则，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